

# 憂鬱的南方 孫元衡《赤嵌集》的臺灣 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

施懿琳\*

## 提 要

本文以安徽文人孫元衡（1661-？）的《赤嵌集》為分析對象，探討清代宦臺人士如何透過中國傳統詩歌既有的文化累積，如何以異鄉人的敏銳耳目，感知臺灣這個南方島嶼「物產」及「氣候」的特殊性？如何將之化為詩篇，作為自己的生命記錄，並傳遞給未曾渡臺者嶄新的訊息？而後進一步分析，宦臺者觀察、書寫的心理樣態。希望藉由文本的詮釋，更具體地了解宦臺者的情意世界，以及面對生命困局的調適之道。並試圖釐清在臺灣這個四季如夏的海島所產生的古典文學作品，與中國傳統詩歌有著什麼樣的呼應關係？又，是否具有屬於臺灣書寫的特異之處？希望提供另一個觀察清代臺灣詩歌的角度。

關鍵詞：清代臺灣、孫元衡、赤嵌集、南方、物候書寫

---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The Melancholy South - Sun Yuan-heng's Writings on Formosan Products and Climate in Chi-Kan Collections and Their Internal Implication**

Shih Yi-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By using Chi Kan Collections of Sun Yung-heng (1661-?), a scholar from Anhui, as the target for analysis, the article is designed to discuss how an expatriate officer in Taiwan for the Qing Dynasty comprehended and sensed the exotic “products” and “climate” of Taiwan, a south island from his homeland, throug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eritage of poetry and sensitive awareness as an “alien”, and how Sun translated them into poems as well as his keen observation of life and sent a new message to his mainland readers. The article will further explore what ideas, or mental state, could lead the expatriate officer to express and incarnate his experience with such a writing.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we attempt to specifically understand the expatriate officer's sentiments and thoughts and how he adapted himself while addressing the dilemma of life. In addition, we probe into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Taiwan – a south island that is hot all year round –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ry, and also try to identify if there is anything specific that exclusively belongs to writings about Taiwan. Following the exploration and discussion provided above, we intend to offer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to observe poetry in Taiw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Taiw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Sun Yuan-heng, Chi-Kan Collections, South, Writing on Products and Climate**

# 憂鬱的南方 孫元衡《赤嵌集》的臺灣 物候書寫及其內在情蘊

施懿琳

## 一、前言

二十世紀中期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前往燠熱無風的赤道，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登陸時寫道<sup>1</sup>：

……船航行的速度緩慢，必須小心避過海灣裡面的大小島嶼。從長滿樹木的山坡上面忽然吹送下來的氣息和涼快的感覺，使人預感到好像和花卉及岩石都已產生了具體的接觸。雖然在事實上還沒看到花卉或岩石，使旅行者先嘗到這片大陸的特性……

李維史陀說的是，當旅行者到達一個陌生地方時，最直接感應到的是標誌著這「新世界」特色的：氣候、地形以及植物。由於緯度、洋流、地勢的不同，造成景觀的差異，旅行者可以透過文字、圖像等媒介，將新履地最具特色之處呈現出來。試著揣想：清治時期，自中國渡海東來的文人初抵臺灣之際，印象最深刻、感受最強烈的會是什麼？他們眼睛看到的是南方特有的草木蟲魚、是具有閩南與南島特色的民居、是雜處的漢人與原住民；耳朵所聽到是軋軋轉動的脆薄牛車聲、是聲如黃雀的守宮鳴叫聲、是「侏離」（臺灣原住民）演唱漢人戲曲的「下南腔」、甚至是滿城不知所云的啾啾「鳥語」；身體肌膚所感受到的則是異於中國內陸的潮濕多風的海島型氣候。風土、氣候、物產、居民的不同，使旅臺者敏銳地感受到異鄉與故土的差異，而給耳目以視聽上的刺激。清康熙年間（1705）來臺擔任海防同知的安

---

<sup>1</sup> 王志明譯，李維史陀著《憂鬱的熱帶》，臺北：聯經，1989年5月，頁92。

徽人孫元衡〈即事〉詩云：「海邦耳目多新獲，島市談言各不聆」<sup>2</sup>、〈曉起漫成〉云：「年來絕塞烽煙慣，博得滄洲耳目新」（1-260），即強調前來臺灣這個海島，在視（目）、聽（耳）經驗上迥異於中土的特殊感受。同年（1705）來臺擔任分巡臺廈道標守備的京衛人婁廣也有類似心情，他的〈臺灣偶作〉云：「島彝越海附中原，節物驚心異故園」（1-366），這和唐代詩人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所寫的「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有著類似的感受。

本文嘗試以孫元衡的《赤嵌集》為對象，探討令宦臺人士「心驚」的「物候」，其具體內容為何？詩人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這些物候書寫有著詩人什麼樣的情感投射？其表現手法與中國傳統詩歌，有什麼樣的呼應關係？又，是否具有屬於臺灣書寫的特異之處？希望藉由本文的探討，提供另一個觀察清代臺灣詩歌的角度。至於將討論對象設定為孫元衡的《赤嵌集》，有幾個原因：

- （1）孫氏於清領初期來臺（1705-1709），在清帝國對臺灣尚未有詳盡認知前，能以敏銳之眼觀察臺灣的特殊性。在臺期間的物候書寫，以及由府城北上巡行所經過的聚落和城鎮的記錄，都相當具體明確，足以清晰地呈現清代初期南臺灣的季候、物產與空間特色。
- （2）《赤嵌集》是清初最早的宦臺詩人別集，其他宦臺者雖亦有詩作，然而在數量上不如孫氏之多，內容面向也不如孫氏之廣。
- （3）《赤嵌集》依來臺時間先後編排，頗能看出孫氏在臺四年的感受與心路歷程，可以據此勾勒宦臺詩人的心靈圖像。
- （4）孫元衡頗具詩才，清初詩壇的領導者王士禎曾為這本詩集做評點，對孫氏之作有相當高的評價；連橫《臺灣詩乘》云：「臺灣宦遊之士頗多能詩，而孫湘南司馬之《赤嵌集》為最著」。因此，就藝術性而言，孫元衡《赤嵌集》實有探討的價值。

<sup>2</sup> 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一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2月，257頁。以下引詩凡出自《全臺詩》者，皆直接標註冊數與頁數（如此詩標：1-257），不再加註說明。

## 二、航向南荒

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安徽人孫元衡（1661-？）<sup>3</sup>因為在四川漢州知州任內表現優良，奉康熙皇帝命令，調遷臺灣擔任海防同知。從官秩上來說，這是職務升級，由「從五品官」（知州）升為「正五品官」（海防同知）；對於一位具有經世濟民思想的文士而言，知州掌一州之事，可以奉獻心力為更多的百姓謀福利，但，轉任臺灣同知，則是一介閒官<sup>4</sup>，與他的理想抱負有若干落差。據《桐城續修縣志》記載，孫氏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好官員<sup>5</sup>，而新任職的「臺灣海防同知」，主要是稽查鹿耳門海口，負責鹽政、緝捕盜匪、海防等行政事宜；兼督臺、鳳、諸三縣捕務，屬知府輔佐，可以發揮的空間似乎不大。更重要的是，從四川遠調臺灣，越渡重洋，前往的又是一個陌生的異域南荒，孫元衡心裡有著許多的不安和無奈。《赤嵌集》中的第一首詩〈除臺灣郡丞，客以海圖見遺，漫賦一篇寄諸同學〉，即是奉命調派來臺之際悒悶不平的心聲：

中原十五州，無地託我足。銜命荷蘭國<sup>6</sup>，峭帆截海腹。披茲瀛壖圖，島嶼紛可矚。回身指南斗，東西日月浴。颶風怒有聲，駭浪堆篷幅。滌汔終古心，瀆瀆萬里目。毫釐晰舟輿，稊米辨巖谷。道莽裸體人，市莽連雲竹。覽者睫生芒，聞之肌起粟。寄語平生親，將毋盡一哭。（1-252）

<sup>3</sup> 孫元衡的年卒年不詳，此據陳家煌之考證而來。參考陳撰〈論孫元衡及其《赤嵌集》〉，《漢學研究》23卷2期，2005年12月，頁293。

<sup>4</sup> 海防同知，俗稱「司馬」。中國傳統文人經常被貶為司馬。史上較有名的是唐順宗時「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的十位士大夫，其中有八位被貶為司馬：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馬、韓泰被貶為虔州司馬、陳諫被貶為臺州司馬、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劉禹錫被貶為郎州司馬、韓曄被貶為饒州司馬、凌準被貶為連州司馬、程異被貶為郴州司馬。此外，較為人所知的，還有被貶為江州司馬的白居易。康熙三十年（1691）來臺任同知的齊體物〈竹溪寺〉故云：「不是許珣多愛寺，須知司馬是閒官」（1-191）。

<sup>5</sup> 該書卷十二〈人物志·宦蹟〉：「孫元衡，字湘南，少孤力學，以明經為山東新城令。邑苦水患，元衡濬孝婦、小青兩河以殺其勢，築隄十八里以扞其衝，捕蝗賑饑，活者無算，以廉能擢蜀之漢州牧。漢故荒僻，招徠流亡四千餘戶，給牛種，教以耕，會爐蠻蠢動，身歷行間，設法轉運，籌備盡善；復以卓異，擢臺灣同知。」

<sup>6</sup> 作者原註：「臺灣本荷蘭地」。

「海圖」是海行用的地圖，標繪可航水域的深度、航標、島嶼分佈和沿岸地形地物……等。當訪客示以來臺航海圖時，想必同時也談到越渡橫洋的艱辛<sup>7</sup>。孫元衡在無奈之餘，發出了「中原十五州，無地託我足」之嘆，天地之大，竟無容身之處，實感傷至極！他將銜命前往的是曾為荷蘭人統治的海島，而非經驗裡稔熟、感情裡親近的「中土」。「道莽裸體人，市莽連雲竹」，藉由當地原住民勇悍不文、當地環境榛莽待啓的蠻荒意象，寫出了前往臺灣的疑懼不安。而這些還都不是眼前最令人擔憂者，披覽瀛壖圖，孫元衡知道渡海種種可能有的危險，對於不諳水性，缺乏越渡海洋經驗的他而言，颶風、怒濤、黑水溝、鐵板沙……許多不可預知的危險潛伏其中，隨時都可能讓人喪命。這種種擔憂，在孫元衡親歷其境之後所寫的〈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1—255）、以及〈黑水溝〉（1—257）等詩作中，都有著進一步的描述。當海圖鋪展在他面前，當赴任之所的種種傳說充盈耳際之時，孫元衡雙眼刺痛、渾身毛竅豎起，對前往陌生荒莽之地充滿了恐懼、疑慮和不安。假如我們因此認定孫氏是一個膽怯的人，恐怕未盡中肯。從孫氏來臺不久，巡行西海岸時所寫的〈吼尾溪〉，可知他原是一位有「奇氣」，勇於「履險地」的人；然而，因年齡逐漸老去，加上環境的奇險，使他在臺之時似乎勇氣全失：

當年上馬身手捷，銀鞍不動根連柯。今乘筭輿仗人力，諸蕃火伴來犇波。虯螭罔象競擎捧，爬沙百腳工騰那。昔不動顏今股栗，織愁編臆紛千梭。平生作事耿奇氣，履險弗懼心靡他。毋迺勇怯隨年改，念此迸淚雙滂沱。（1—270）

對照六年前（1699）孫元衡奉命從山東調派到四川時的狀況，似有若干落差。赴川之初，他有〈留別諸同寅〉<sup>8</sup>詩，亦可見到他對新調派地的憂懼：

<sup>7</sup> 孫氏詩云：「峒帆截海腹」，即是描述越渡「橫洋」的狀況。另外，孫氏〈黑水溝〉詩前序有詳述：「大海洪波，實分順逆；凡適他國，悉循勢以行。惟臺與廈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黑洋』，廣百餘里，驚濤鼎沸，勢若連山，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為弱水；雖無可考證，然自來浮去之舟，無一還者，蓋亦有足信焉。」（1—257~258）

<sup>8</sup> 《片石園詩》卷二，康熙四十九年刻本，頁18。

驚聞巴蜀六千里，欲去愁添兩鬢霜。駑馬穿雲臨劍閣，扁舟載月問瞿塘。夢回秦塞鶻啼切，書到衡州雁斷行。贏得故人相憶處，房公湖與浣花堂。

蜀道難行，自古即然。所以駕駑馬、越劍閣；乘扁舟、過瞿塘，同樣令人充滿不安與憂愁。不過，跋山涉水，一步步往四川趨近時，孫元衡的心情似乎越來越開朗，試看〈元日舟中〉<sup>9</sup>一詩，儘管路途艱辛，峽灣險惡，孫元衡已無原先的畏怕之情，反而是充滿歡喜與期待：

蜀國孟陬好風景，推篷起視心徘徊。琵琶峰上日初出，雲雨峽邊春正回。椒酒清江對天酌，梅花古戍迎人開。即今打鼓發船去，飽看瞿塘灩澦堆。

「蜀國孟陬好風景」，一開頭即肯定了蜀地風景之佳美，令人驚喜。「推篷起視心徘徊」，推開篷窗，見此山水勝境，讓人流連忘返<sup>10</sup>。接著寫琵琶峰上的日出、雲雨峽邊的春色，尤其是瞿塘灩澦堆的湧浪，更令人嘆為觀止。雖然與渡臺同樣有「遠宦」的愁慮，但是，果真踏履其地之後，孫元衡在兩地卻呈現了「喜」與「懼」不同的心情。入川，由憂愁轉為歡喜；而渡臺，卻似乎有歷劫歸來的餘悸猶存。雖然，他在〈抵臺灣〉詩裡猶作灑脫語：

浪言矢志在澄清，博得天涯汗漫行。山勢北盤烏鬼渡，潮聲南吼赤嵌城。眼明象外三千界，腸轉人間十二更<sup>11</sup>。我與蘇髯同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1—259）

「茲遊奇絕」的背後，其實有著許多怖慄、驚恐，籠罩在濃重的死亡陰影中，這從他記錄渡海經驗的詩歌〈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可以獲得具體的了解，茲摘錄該長詩之片斷，以略見航行的險狀：

……飛廉倏來海若怒，積颶鼓銳喧鯨鯢。南箕簸揚北斗亂，馬銜罔象隨蛟犀。暴駭鏗訇兩耳裂，金甲格鬥交鼓鞞。倒懸不解雲動席，宛有異物來訶詆。伏

<sup>9</sup> 《片石園詩》卷三，康熙四十九年刻本，頁1。

<sup>10</sup> 《明史·湘王柏傳》：「遇山水勝境，輒徘徊終日。」徘徊在此有流連之意。

<sup>11</sup> 作者原註：「渡海以更紀程，自廈至臺計十二更」。

艚僮僕嘔欲死，膽汁瀝盡攣腰臍。長夜漫漫半人鬼，舵樓一唱疑天雞。阿班眩睫痿筋力，出海環玦頻難稽<sup>12</sup>。不見彭湖見飛鳥，鳥飛已沒山轉迷。旁羅子午晷度錯，陷身異域同酸嘶。況聞北嶠沙似鐵，誤爾觸之為粉齏<sup>13</sup>……（1—255）

抵臺之初，孫氏自比為當年遠謫海南島的蘇軾，同樣有著「九死南荒」的危險；但他們都能以豁達的態度，笑看滄桑，轉換心情與視角，將這一次充滿刺激挑戰的遠宦，當作生命中絕無僅有的「奇險之遊」。

值得注意的是：孫元衡與蘇軾的現實處境，其實並不相同。清代到臺灣任職，並非如前往西北或東北，是「流」、「貶」之所<sup>14</sup>。孫與蘇雖然同樣有「渡海經驗」，同樣前往「雕題文身」之地，但兩人在政治上的處境迥異——蘇是「遠謫」，而孫則是「調升」，將自己比擬若東坡，其實不完全切合。何以孫元衡會將自己與蘇軾相提並論？從孫曰注（孫元衡之弟）《片石園詩》<sup>15</sup>的後序中，可以比較貼近地了解孫氏宦臺時內心的感受：

……比年計吏遷蜀之漢州牧，地數罹兵燹，所隸秦楚流頑，向稱難治，不數月而獄訟衰息；於是閉戶讀書，以詩為課，躬率僮僕，耕鑿自供，上官賢之。凡蜀大利害，罔不借箸，而巴賈蠻獠披髮貫耳之徒，悉傾心焉……旋以計偕入都，特奉臺灣司馬之命，銜頭雖換，無異播遷，兄夷然就道，意如昌黎之在潮、眉山之在惠，為詩文以自娛樂。

「銜頭雖換，無異播遷」相當清楚地指出當時大多數奉命來臺仕宦者的感受。領臺之初，為使臺灣快速納入常軌，清政府頗積極地調派人才，前來經營臺灣。施琅在〈臺灣棄留疏〉中曾建議：「其防守總兵、副、參、游等官，定以三年或兩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頒定：

<sup>12</sup> 原註：「海舶內稱望遠者為阿班，舟師為出海」。

<sup>13</sup> 原註：「彭湖山南有北嶠，下為鐵板沙，濟海之舟不見彭湖，則不敢南渡」。

<sup>14</sup> 參考周建軍《唐代荆楚本土詩歌與流寓詩歌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5月，頁139-141。

<sup>15</sup> 《片石園詩》乃孫元衡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684-1705）來臺前之詩作。該書〈後序〉謂孫氏：「治郡數月間，取向所刻片石園詩，稍加增刪。分遊覽、贈答諸什為一刻，凡四卷；感懷、紀事諸什為二刻，凡二卷。至海外詩，則別為《赤嵌集》凡四卷」。



臺灣各官自道員以下、教職以上，俱照廣西南寧等府之例，將品級相當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三年俸滿即陞。

爲了治理這個新納入清國版圖的海島，清初調派人員來臺灣的態度相當謹慎，也給予宦臺者優渥的待遇。但，天遙地遠、越渡重洋，對仕宦者而言，實無異於遠謫。因此，儘管任滿之後將有升遷的機會，但是從詩文作品中，卻可以看到宦臺者歡喜之情少，哀傷、無奈的漂泊之感深，播遷遠宦的天涯羈旅之感，遂成爲清初宦臺人士的感情基調。遠渡重洋，歷盡海上顛簸來臺，是慣習於陸地生活的仕宦者絕無僅有的經驗。雖然海行可以看到過去所不曾見到的特異景物，即將前往赴任之所，也是與過去生命經驗迥異的新世界。然而，對這些並不希望成爲冒險家的文人而言，事實上是充滿痛苦和無奈的。

航向臺灣的途中，孫元衡腦中印記的是先前聽聞的，與有關臺灣的古老神話傳說；是海客展示的航圖裡，充滿山海經式的怪誕想像。登陸之初，那些嵌印在意識底層的圖像，隱藏在圖像之內的顫慄、恐懼，想必時時在他心中晃盪起伏吧？這些因「宦」而不得不「遊」的文人，與對旅遊充滿興趣的「好奇之士」<sup>16</sup>並不相同。他們看到以南島語系土著爲主的臺灣，不只居民的體質種族與中原不同；許多屬於臺灣特有的物產，以及特異的風土民情，亦迥異於內地。尤其臺灣爲具亞熱帶與熱帶雙重特色的海島<sup>17</sup>，氣候的炎熱潮濕，以及潛藏在山林曠野的瘴毒，最爲人所不堪。「季候」的變化、「物產」的差異，遂成爲從中原前來臺灣的宦遊人士們最先感知的對象。婁廣說「節物驚心」乃緣於「異故園」，相當中肯地點出了宦臺者之所以有不少詩歌以「物候」爲寫作題材之故。而這種「差異書寫」，遂成了清代，尤其是清領初期宦臺人士的詩歌寫作特色之一。

### 三、《赤嵌集》中的物候書寫與感情蘊意

<sup>16</sup> 如明代的徐霞客，清初的郁永河，均屬之。

<sup>17</sup> 臺灣處於北迴歸線上。北部屬亞熱帶氣候，南部屬熱帶氣候，中部則爲兩氣候型間的過渡氣候。

臺灣僻在東南隅，地勢最下，其去中州最遠。故氣候與內地每不相同，大約熱多于寒，恆十之七，故有「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之說。秋無霜，冬無雪，獸炭、貂裘無所用也，故土番、窮戶無衣褐亦可卒歲。花卉則不時常開，木葉則歷年未落；瓜蒲、蔬茹之類，雖窮冬花秀。此寒暑之氣候不同也……（蔣毓英《臺灣府志·氣候》）

康熙二十四年（1685）蔣毓英編修的《臺灣府志》，從「地勢最下、離中州最遠」的角度，說明臺灣氣候與中國內地殊異之因，這是清朝官方最早對臺灣氣候的記錄。次年高拱乾編修的《臺灣府志·風土志》，大致承襲蔣氏之說，只將「氣候每與內地不同」改為「氣候與漳泉已不相同」，更細緻地呈顯臺灣與中國，乃至地緣關係極密切的漳泉地區間的差異。歷來在中國的領地裡，除了瓊州（海南島）之外，臺灣算是最偏南的統治地區。這個康熙二十三年（1684）才正式納屬中國版圖的海島，氣候之炎熱潮濕、蠻荒多瘴，為中土人士所不堪；高拱乾明確地指出：即使地緣關係與臺灣最密切的福建漳泉人士，也可以感受到氣候的不同，而「熱多於寒」是其間最大的差別。康熙五十六年（1717）周鐘瑄編修的《諸羅縣誌·雜識》對此有更詳盡的描述：

臺灣……春燠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雨而無雪，多露而少霜。田禾播種以後，亦喜露而畏雨。此一郡之大概也。

幾乎從春天開始，就進入炎熱的季候了。對於異鄉人而言，前往一個陌生的土地，最難以忍受的恐怕是氣候適應的問題。德國著名的醫生兼人類學家魯道夫·威喬（Rudolf Virchow）曾在科學研究報告裡曾對這現象做了說明<sup>18</sup>：

就像一個人離開祖國去異鄉，顯得與那裡格格不入。也許最初會有一些新鮮，但是，過了一陣子，頂多幾天，就會感到不適。根據環境不同，他需要幾天、幾週、甚至幾個月時間，才能夠重新找到平衡……

氣候環境對人的影響確實相當大。臺灣居於亞熱帶與熱帶地區，為歐亞大陸和太平

<sup>18</sup> 尼科·斯特爾、漢斯·馮·斯多赫著，李理譯《氣候、天氣與人類》，臺北：晨星，2005年5月，頁53-54。

洋的交會處，四周海洋環繞，同時受到大陸性氣候及海洋性氣候所影響。加上南北向有高聳山脈縱貫全島，地理環境複雜，形成臺灣多樣性的特殊氣候。然而，不管氣候多麼複雜多變，來臺人士對臺灣風土氣候的描述與記錄裡，「炎熱」是最重要的元素，最能夠鮮明地突顯南國風味，也最能感受到自己與這海島氣候的「格格不入」。閱讀日治時期小說，我們經常會讀到日人或以「日人之眼」看臺灣的作品裡，對於當地濕熱氣候的描寫。比如擅長呈顯南方異國情調的龍瑛宗，在他成名之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sup>19</sup>裡，對臺灣潮溼炎熱氣候的書寫，必定讓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吧？

陳有三……脫下濕淋淋的襯衣，絞乾之後，晾在籃子上。房間裡只有一個極小的格子窗，從窗口可望見綠油油的蔗園那邊工廠像白色的城堡。但，馬口鐵皮屋頂所吸收的熱量，壓縮全身似地暑熱。被曬成褐色的臉上，油汗黏黏；禿裸的身體，不斷地冒出大粒的汗珠。

……正午的太陽像要燒焦腦門那般強烈照射著。街上滿溢白光。路上只看到一個從山上來的年輕女子，扁擔壓得彎彎地挑著一擔木柴走過去。穿著短黑褲子和藍色上衣，她的茶褐色的臉上，汗水淋漓，神色像燃燒的玫瑰色，微微的困憊停留在美麗雙頰上。

這是廿世紀中期（1937）的臺灣氣候書寫；假如，將時間往前推，十八世紀清領初期，從中國內地渡海東來的文人，又是如何感知臺灣這個海島的氣候，如何透過文字將之記錄下來呢？茲以《赤嵌集》為對象，探討孫元衡如何透過詩歌作品，表現最具南國風味的「炎蒸濕熱」，這樣的書寫具有什麼樣的特色？蘊含了作者什麼樣的思維？而後進一步觀察，孫氏又是如何來書寫春秋冬其他三個季節？在詩作中表現了什麼樣的內在情思？

### （一）丹蛇折鱗龍解角：說熱

「炎熱」是《赤嵌集》中最具特色的季候書寫，以下嘗試從三方面進行分析：

<sup>19</sup> 引自施淑編《日據時期臺灣小說選》，臺北：前衛，1992年12月，頁208、210。

## 1、援引神話、典故以強調炎熱

孫元衡於 1705 年春天渡海東來，抵臺之初<sup>20</sup>所寫的多為篇幅短小的詩作；來臺後第一首長篇詩歌，乃以夏季的炎熱為主而書寫的〈海南入夏困於炎蒸，陰晴不定，次園、任畦占驗持勝，因次其語作歌調之〉，在詩歌中用了許多神話中具體的物象，與傳統中國詩歌裡的典故，來表現臺灣炎熱的氣候：

火山赤坂窯為烘，跼跼鳶鳥墮水中……丹蛇百尺吐光曜，十日並出扶桑紅……腫蟻孺鼈酬海若，烝鳧炙鵠天吳宮……流金爍石天所毒，倒井翻盆驚夏凍。兩臂一腳齊鳥舞，袒身短鬼何頑凶。汗濡柱石蛟脣涇，燄赫焦煙鼉鼓洪。萍葉始生魚响响，蒺藜既苑蟲蕞蕞。陣旋庭戶犇馬蟻，翅撲窗寮喧蟻螿。老鶴鳴垤窺窟宅，拙鳩喚婦歸房櫳。魯陽戈揮返三舍，夸父棄杖行當窮。欒巴喫酒火為滅，巫尪焚卻終疲瘳……羿彈解羽躡威武，媧鍊上補貪天功。大光長世樂無極，三十六度休徵蒙。大荒之外國窮髮，瀛壖以南人洞胸。坐見雕題黑齒裔，肉人醢骨危其躬。農夫狼顧憂旱澇，爾獨胡犢愚頑衷。吳牛喘月連龍喜，物性詭譎良難同。為召黔雷解其說，答之天道猶張弓。(1-261)

孫氏向以博學、喜用典故著稱，這首詩是他初次感受到臺灣炎熾燠熱而寫的長篇歌行體。可能是初來乍到，尙未能做細緻觀察；也可能是感受太過強烈，暑夏的熾熱雖是親身經驗，卻不採用寫實的手法，而承繼了中國傳統文學裡對「苦熱」主題的描寫，大量採用《楚辭》、《山海經》裡的神話，對熾烈如火的臺灣氣候做了誇張的描繪。首句「火山赤坂窯為烘」，「火山」與「赤坂」並列，將炎熱譬喻為如同高熱燒烤的瓦窯般，火紅灼燙，形象極為生動。「赤坂」，又作「赤阪」，為西域地名，自古以酷熱著稱。鮑照〈苦熱行〉：「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李善注引《漢書·西域傳》云：「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因為過度炎熱，頭痛、嘔吐不斷，遂令整個人都虛脫了。而「跼跼鳶鳥」，則轉化自鮑照〈苦熱行〉的「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後漢書·馬援傳》曾記錄西域地區炎熱且易發毒，致使飛鳥墮水而死的奇異景象：

<sup>20</sup> 《赤嵌集》裡孫氏真正踏到臺灣這塊土地後所寫的詩，以〈抵臺灣〉二首開始。參考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一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2月，129頁。

「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都將「暑熱」與「瘴毒」相連結，予人無法喘息的致命之感。接下來，孫元衡再以生動的形象繼續寫熱：「丹蛇百尺吐光耀，十日並出扶桑紅」，「丹蛇」指赤色的長蛇。古代詩文中，多用於描述炎旱苦熱<sup>21</sup>。至於「十日並出」與「扶桑」的典故，則出於《山海經》的〈海外東經〉「……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在黑齒（國）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傳說日出於扶桑之下，拂其樹杪而升，因謂「扶桑」為日出之處，其炎熱灼熾可知。此外，孫元衡詩中還引用了「魯陽揮戈」，「夸父棄杖」、「女媧補天」、「羿射九日」等諸多與「炎熱」有關的神話，並取材自《山海經》的「大荒之外國窮髮，瀛壖以南人洞胸」等海外異境之描寫……藉著既有的描寫赤地炎方之典故，以及神話故事裡種種荒誕詭異的圖像，嘗試將來到臺灣這個異域炎方之後，所感受到的嚴酷暑熱展現出來。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孫氏題目裡以「炎蒸」二字概括臺灣暑夏的季候特色，其實卻大幅地傾向「炎熱」書寫，「蒸」字所具有的「潮濕」感，並沒有被具體地表現出來。這或許和中國傳統文學寫「炎熱」的區域，大多在乾燥的西域一帶有關；更明確的原因，有待進一步考察。

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炎熱，若逢荒旱，就更痛苦難當了。孫元衡抵臺第一年的秋天，適逢臺灣大旱<sup>22</sup>，從他當時所寫的相關詩作中，可以略知那種大地龜裂，萬物枯萎的荒渴景象：

靈海濩諾天為關，迴互中原乖百蠻。鼉鼉窟外裸人國，當今神武威愚頑。命官分職列星宿，鐵騎戈船肅偵探。雕題大耳文蛇衣，更不肉人工戰鬥。魚鹽可賈沙可耕，蔗田千竈煎為錫。九軌車音雜哀角，市廛不減無諸城。旻天陽道黃塵起，時見早龍升海底。天倉嘒嘒天稷暗，太微木入河無豕……建壇十丈赤嵌邊，維南有箕北有斗。蹶張武人生怒嗔，鞭撻頭陀咒鬼神。焚巫暴尪古所戒，此豈有力回天津。扶杖強起對遼廓，池荷枯死芙蓉落。南方火雲燒太清，片月懸弓氣蒸灼。斯牲靡愛薦惟馨，圭璧既卒神莫聽。祀山斬木誣百

<sup>21</sup> 鮑照〈苦熱行〉云：「丹蛇踰百丈，玄蜂盈十圍。」明代何景明〈憂旱賦〉亦有：「託丹蛇之十圍兮，恐文蟻之射人。」的描寫，由此可略見中國傳統文人寫氣候之炎熱，有著某種程度的因襲、模仿。

<sup>22</sup> 臺灣府志有載。又，可參考徐泓《清代臺灣旱災史料彙編》，行政院國家防災科技研究報告，1983年，頁25-34。

靈，及時省過戶且肩。殮齒收骨平厥刑，怨懟驕蹇兩不形。肥遺自死人自寧，周官荒政還當銘。（〈禱雨篇〉，1-267）

丹蛇折鱗龍解角，扶桑曦馭騰東井。頭痛山南天毒西，片月當中墮焦影。牽牛脫軛河漢枯，織女停梭空引頸。大鵬戢翼大鯤潛，洪從祖公醉不醒。欲乞玄霜飛雪丹，滌滌山川心炯炯。（〈苦熱行〉，1-267）

旱魃為虐，不只大地枯竭，海沸如湯<sup>23</sup>，連太虛也被南方之島的火熱給焚燃了、天上的弦月也被熱氣給蒸烤得變形了……孫元衡在〈苦熱行〉裡，繼續延襲前人對炎方的想像書寫，植入扶桑、羲和、牽牛、織女等神話，讓這把旱烈之火，從地面延燒至天上，從夏天<sup>24</sup>延燒至秋季；整個宇宙都要因之而銷融了。

孫元衡詩雖常沿用過去既有的典故與模式，但細細讀來，卻可發現孫氏這兩首「秋旱詩」與傳統中國文人的炎熱書寫有著某種程度的差異：致使「池荷枯死芙蓉落」、「南方火雲燒太清」，致使「丹蛇折鱗龍解角」、「片月當中墮焦影」的季節不是炎夏，而是臺灣的秋季；這對四季分明的中土人士而言，實在難以思議。臺灣「四時皆是夏」<sup>25</sup>的季候特色，遂由此強烈地展現出來。此外，「魚鹽可賈沙可耕，蔗田千竈煎為錫」更將臺灣的海國特色（魚、鹽），及熱帶風味（蔗田）展現無遺。尤其，將蔗田裡的甘蔗燒煮成糖漿的「千竈」，不是別的，正是天上火球般滾燙的炎陽，這個生動而有趣的譬喻，使得孫氏的苦旱書寫呈顯了別具南國特色的臺灣風情。

## 2、書寫南國物產以隱喻炎方

除了從傳統的神話、典故、語料擷取靈感來誇飾鋪張描寫臺灣炎熱氣候外，另一個常見的方式便是：藉由具南國風味的物產，作為赤地炎方的隱喻。清初宦臺人士的活動空間，多以位居「熱帶」的南臺灣為主，因此，清初宦遊人士對臺灣氣候

<sup>23</sup> 參考宋永清〈踏災行〉：「自夏徂秋兮 旱魃為殃 泉涸煙生兮 海沸如湯……」，詳見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三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2月，頁359。

<sup>24</sup> 是年夏天已有荒旱現象，孫元衡有〈夏旱〉一首，詳見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一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2月，頁265。

<sup>25</sup> 張湄〈氣候〉收入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二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2月，頁178。

與物產的觀察，頗多描寫熱帶風物者。乾隆二十八年（1763）擔任臺灣知縣的浙江人夏瑚〈秩滿留別臺陽〉詩云：「兢兢捧檄渡瀛壖，風物臺陽別有天」（2-354）、同年由德化教諭調任鳳山縣教諭的福建文人朱仕玠，則在〈瀛涯漁唱〉中寫道：「番疆物類信難齊，炎帝圖經失考稽。」（2-398）都指出了臺灣由於特殊的氣候環境，使得當地的物產殊異於中土；即使中國傳統用以理解南方的「圖經」<sup>26</sup>，亦無法完全周全地提供參考的訊息。

考察方志〈風俗志·物產志〉可知，臺灣的物產相當豐饒，修志者通常將物產分爲：稻、麥、黍、稷、菽、蔬、果、布、貨、藥、竹、木、花、草、畜、羽、毛、鱗、介、蟲等若干門類來做記錄。在「草木花果」的分類裡，扶桑、赤桐、石榴等顏色鮮紅的花，西瓜、檳榔等足以驅熱除瘴的果，尤其被視爲「剝之凝如水晶，食之消如絳雪」<sup>27</sup>的南方珍品「荔枝」，是宦遊詩人最常用來與酷暑勾連的書寫對象。

以孫元衡爲例，他喜歡寫豔紅色的花卉，藉由亮麗鮮明的色彩描摹，將臺灣烘映成火紅的赤地炎方，顯現出特異的南國風情：

燒空處處佛桑燃，寒暖花魂總放顛<sup>28</sup>。大海東頭當曉日，丹山腳下對晴煙。  
眼明五月朱榴火，淚濺一春紅杜鵑。粉白嫩黃相映發，遙情將向洛陽天。（〈詠佛桑花〉，1-265）

春色燒空白海涯，柳營繞遍到山家。崑崙霞吐千層豔，華嶽蓮開十丈花。百  
朵紅蕉簇一枝，偶然著葉也相宜。煙籠絳羽鸚哥舞<sup>29</sup>，信是春城火樹奇。（〈刺桐花〉二首，1-327）

佛桑<sup>30</sup>又稱「扶桑」、「朱槿」、「照殿紅」，原產於中國南方。花色大多爲

<sup>26</sup> 圖經，是一種以圖爲主或圖文並重，記述地方情況的專門著作，又稱圖誌、圖記。乃中國方志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編纂形式。目前所知的圖經，以東漢的《巴郡圖經》爲最早。

<sup>27</sup> 參考宋興化遊仙人蔡襄的《荔枝譜》，《四庫全書》〈譜錄類三·草木禽魚之屬〉。

<sup>28</sup> 作者原註：「四時常開。」

<sup>29</sup> 作者原註：「雲南稱爲鸚哥花。」

<sup>30</sup> 蔣師轍編《臺灣通志》〈物產·草木類〉：「佛桑，色朱，其葉似桑，一年長開，朝至暮隕。《學圃雜疏》：佛桑有紅黃諸色，一名扶桑，其單葉者名照殿紅（《諸羅縣志》）。有朱紅、淡黃二色，一名牽牛（《彰化縣志》）。又呼大紅花（《噶瑪蘭廳志》）。佛桑即扶桑，蒂弱，開每下垂，易落（《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一三〇種，頁170。

紅色，故嶺南稱之為「大紅花」；又有桃紅、橙黃、粉紅、白色等品種。稱「朱槿」、  
「大紅花」主要強調它緋紅的色彩；而「照殿」、「扶桑」（日出之地）則又突顯  
了花光的明艷燦亮。至於，屬於蝶形花科的刺桐花<sup>31</sup>，主要分布在熱帶亞洲與太平  
洋洲諸島的珊瑚礁海岸，所以又稱為「珊瑚樹」；雲南人則稱之為「鸚鵡花」。花  
大多為絳紅色，葉如梧桐，其花附幹而生，枝幹有刺。孫元衡在詩中註云：「色紅  
如火，環繞營署，春仲始花，一望無際，實為臺郡大觀，故稱刺桐城」。〈詠佛桑  
花〉寫於孫氏來臺第一年的夏天；〈刺桐花〉則寫於第三年的春季，雖然季節不同，  
詩人卻同樣使用了「燒」、「燃」、「映」等與「火」或「日」相關的動詞；使用  
了「丹」、「朱」、「紅」、「霞」等濃烈的顏色，以及「曉日」、「絳羽」、「火  
樹」等紅色系列的語彙，藉由書寫紅豔如火的花，在熊熊的花光映照下，將他們眼  
中的「四時皆是夏」的炎熱之鄉，透過視覺與觸覺，具體地突顯出來。

由於臺灣氣候炎熱之故，「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生長在高溫潮濕的  
南方產物「荔枝」，也就成了前來天南絕域者心心念念的「消暑」佳果：「時當燠  
煜，客或煩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快」<sup>32</sup>。荔枝以其香氣清遠，果肉晶瑩  
剔透、飽滿多汁，足以作為南方消暑之極品。孫元衡來臺的第一年寫了好幾首與「荔  
枝」有關的詩：〈喜荔枝船到〉、〈詠荔枝〉二首、〈累日望荔枝船不到〉、〈最  
後買得荔枝友人言味少遜率成一絕〉<sup>33</sup>，都可看出他對這南方佳果的喜愛：

頗怪繁星謫軟塵，筠籠將出故鮮新。味含仙意空南國，姿近天然是美人。舟  
屬潛胎珠玑瓌，脂膚滿綻玉精神。一時喚起狂奴興，萬事灰心渡海身。（〈詠

<sup>31</sup> 蔣師轍編《臺灣通志》〈物產·草木類〉：「刺桐花，似蓮蕉花而大，花絳紅，一枝數十蕊。二、三  
月盛開，恍惚斑支樹高大，枝葉蕃茂。雨晴折枝，插地即生，亦易長。初生多刺，長而刺落，垂蔭  
如梧桐（《諸羅縣志》）。垂蔭如梧桐，幹多生刺（《臺灣府志》）雲南稱為「鸚鵡花」（《鳳山縣志》）。  
葉如梧桐，其花附幹而生；枝幹有刺，色深紅，花紅則葉生（《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一三  
〇種，頁 103。

<sup>32</sup> 引自張九齡〈荔枝賦〉，收在《全唐文》第三部，卷二百八十三。

<sup>33</sup> 此外，有雖未以「荔枝」為題，詩中卻有提及「荔枝」者：〈書室小院廣不盈丈，友人方子雋年隨  
手涉趣便成幽賞，授簡賦詩得山字〉：「……護竹斜添檻，移屏曲隱關。荔枝樽酒綠，相就一開顏。」  
〈酒家〉：「海角情多漫，貪為酒肆鄰。蔗漿濃碧椀，荔子豔燒春」〈冬日草堂漫興〉：「吹斷橫洋十  
日風，惠泉不到荔枝濃。玲瓏豔雪無文柚，且耐酸寒剝海紅。」



荔枝》，1-262)

臺灣的荔枝來自福建興化、漳浦，多由海船載來。一日夜可至，色、香、味均不變；雖非臺產，但它與炎熱的南方關係極為密切。遠宦文人懷著傷心絕望之情前來臺灣這個南荒絕域時，用滋味最佳美的鮮果安慰內在的困頓寂寥，可以是一種有效的消解或轉化愁鬱的方式。這也是為什麼蘇軾貶謫到惠州時會灑脫地吟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食荔枝〉），物質的滿足確實可以稍稍撫慰受創的心靈。明人宋珏謂夏日食荔如「身臥火城而神遊冰谷」（〈荔枝譜〉），說得頗為中肯。身在熱帶地區的南臺灣，尤其是在夏季時分，氣候之炎熱，實有若身在「火城」之感。因此，若能因南來之故，看到離離朱實，一嘗晶瑩甜美、足以消暑解熱的荔枝，或許稍稍可以安慰越渡重洋、遠宦蠻鄉的痛苦吧！孫元衡〈詠荔枝〉對荔枝滋味之甜膩鮮美的誇讚（「味含仙意空南國」）、對其冰肌玉膚、燦若明珠的形色之描寫（「舟廚潛胎珠玑瓌，脂膚滿綻玉精神」），基本上是依循過去文人書寫荔枝的模式而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首句將渡海來臺的荔枝，視若自天上貶謫軟塵的繁星，來到臺灣這個異域鬼國棲身，實在令人驚怪訝嘆（「頗怪繁星謫軟塵」），這其實也是詩人身世之感的投射。將自己的處境與南方佳果綰結在一起，使得詩作在詠物之餘，又沾染上屬於詩人的主觀情感。

### 3、寫實見之景

有時詩人並不假借典故或南方物產來書寫炎熱的感覺，而是直接將實見之景，以近乎白描的文字記錄下來：

八月渾如夏，冰紋枕簟斜。渴虹淹溽暑，毒霧莽風沙。破夢無名鳥，傷心未見花。自憐情漫浪，更擬著浮槎。（〈秋日雜詩〉二十首之二，1-309）

物態浮觀物理沉，瘴山淺歷瘴雲深。四時氣有三時夏，一日風生半日陰<sup>34</sup>。海外自知堅道念，病餘不覺長禪心。大通中散無由覓，九籥應難鍊紫金。（〈病中〉四首之一，1-343）

<sup>34</sup> 作者原註：「俗稱九月鳥」。

兩詩都一再強調臺灣炎夏的久長，令人感到燠熱難當。而這個「熱」，不單只是溫度的高，它同時勾連了「毒霧」、「瘴雲」等南蠻荒地的致命意象；此外，「破夢」、「傷心」、「病餘」也都不是愉悅的情緒。孫氏對臺灣的溽熱所抱持的態度，以〈暑中書所歷〉表現得最為鮮明：

羈愁島嶼倍關山，浮世何由駐好顏。日月總如行水上，晦明不似在人間。地能簸蕩沙能沸<sup>35</sup>，風最顛狂雨最慳。填委簿書當溽暑，投荒偏未許投閒。（1-264）

在令人難以忍受的炎熾暑夏裡，孫元衡以一介「卑官」被囚困在南方海島，除了前述的瘴氣毒霧之外，又要面對夏季常有的地震、颱風、荒旱；同時要忙於處理財務出納等瑣碎繁雜的公務。「投荒偏未許投閒」，投荒遠宦，卻又無法置身於清閒境地，真是無奈至極。末句呼應了首二句「羈愁島嶼倍關山，浮世何由駐好顏」，「關山」本在天遙地遠處，而臺灣這個海上孤島的阻絕和險難，更遠遠地超過越度關山的羈愁。如此，怎麼可能有好容顏呢？細讀孫元衡在臺四年，此心常在憂愁鬱悶中。而臺灣的「炎熱」，則是增添他痛苦的根源之一。試看他在來臺第二年（1706）所寫的〈雨止〉詩：「千憂一釋秋將及，諸苦全消暑乍收。滿院天香人靜後，未知身在海東頭。」（1-294）原來讓詩人「千憂一釋」、「諸苦全消」的憑藉，竟然是久旱之後的清涼雨，則「炎熱」對宦臺者造成的憂愁煩苦由此可知。

清代來臺詩人，反覆書寫炎蒸，不僅止於實況描述的層面；寫酷烈難當，也不完全只緣於身體的不舒適。有更多的因素在於：被孫氏稱為「日南」、「天南」、「南荒」的臺灣，是宦臺者內心裡驚懼、印象裡陌生的「他方」；而高溫溽熱，則彷彿發酵劑，讓詩人以濃烈之筆竭盡全力地刻畫、勾描。雖然書寫的數量不多，卻在臺灣詩人的物候詩裡別具特色。

## （二）變調的春秋冬

由於「四時氣有三時夏」之故，宦臺者對海島季候的觀察和體會，和內地迥然

<sup>35</sup> 作者原註：「歲屢地震」。

不同；因此他們筆下所呈現的春秋冬三季書寫，往往有著傳統調性之外的變異。

### 1、霜葉似花何處有：尋找秋天

《文心雕龍·明詩》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傳統中國文人的詩歌作品裡，「寄物陳思」的自然描寫，極為常見。一般說來，春夏秋冬四時之中，對人類心靈產生巨大震撼的，當推春秋兩季<sup>36</sup>；尤以「悲秋」為中國文學傳統中的重要類型，它具體而深刻地見證了中國文學「抒情言志」特質中的「感傷」基調<sup>37</sup>。

考察清代來臺仕宦的文人詩歌，「春」、「秋」兩季的作品確實要多於「冬」、「夏」，以孫元衡《赤嵌集》為例，在臺四年，他四季的寫作數量，分別是：春季佔總數量的 47.77%、秋季 32.08%、夏季 12.13%、冬季 8.09%（詳見附錄）。

雖然在秋季寫的詩，數量稍遜於春季。然而，細究其內容，對於「秋」的書寫，其深刻動人處似乎要超過「春」的描寫。值得注意的是，來臺詩人寫「秋」，似乎與傳統中國感傷的悲秋主題有所不同，可以視為秋季書寫的歧出或變調。

孫元衡來臺第一年的中秋，在香港潛浮、狂潮撲天的異鄉賞花、飲酒，忍不住發出了「海闊偏宜月，天南不覺秋……一杯鄉國酒，休為看花留」（〈中秋夜對月〉，1—266）的感慨。雖逢佳節，但晴暖的「天南」卻讓北人感覺不到一絲秋意，因而悵若所失；入秋以後，孫元衡在多首詩篇裡，似乎不斷地嘗試尋找「秋天」：

過海重行五百里，到山更上一層臺。地留歸路還非客，秋在中原不用哀。霜葉似花何處有，瘴雲潑墨幾時開。固應未落詩人手，判卻鴻荒待後來。（〈大武郡登高〉，1—272）

散步空庭獨斂襟，此身端與世浮沈。淒迷海國看雲地，宛轉秋宵對月心。那得來鴻逢去燕，每思紅葉間青林。大都百物無聊賴，滿耳寒螿不是吟。（〈秋

<sup>36</sup> 參考紹毅平譯，小尾郊一著《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頁29。

<sup>37</sup> 參考何寄澎〈悲秋—中國文學傳統中時空意識的一種典型〉，《臺大中文學報》7期，1995年4月，頁78。

日偶感〉，1-294)

黃菊難尋處士家，也無楓葉受霜華。海東秋思知多少，為問牆邊消息花。(〈重九日偶題〉，1-296)

在「滿城鳥語秋多暖」(〈返署〉，1-274)的西部平原，既感覺不到蕭颯的秋意，也看不到傳達秋天訊息的薄霜、鴻雁、紅葉、黃菊……等具體物象。來臺的第一年，利用巡行之便，孫元衡曾到大武郡(今南投)氣溫較低的山區尋找如花般紅豔的霜葉，然而，即使在山中，秋意依然不可尋；只有濃得化不開的瘴雲，有若他心中難以化解的鄉愁。其他如「秋衣炎未著，夜戶瘴難開」(〈戲成〉，1-318)、「驕亢入秋天，村中乏井泉」(〈秋旱〉，1-318)、「杪秋似初夏，和風正輕靡」(〈閒遊羨子園林〉)、「南天草木逃秋令，爛熳驚看鏡裡霜」(〈獨坐有感〉，1-347)等詩句，都可以看到「炎夏」的氣息仍緊緊地與秋季纏結，暖風、瘴氣、驕陽、亢旱，以及在暖熱氣候下，繁茂生長的南方草木……都令詩人感到百無聊賴，甚至有著莫名的憂傷。

為何找不到「秋天」，令詩人惆悵萬端？這恐怕得從宦臺文人的內在情意世界來理解。前面曾述及孫元衡奉調來臺的心理：「銜頭雖換，無異播遷」；而在康熙四十七年任期已滿，即將調派到山東任職，孫氏回顧初剛來臺的心情也有「初到似逋還似謫」之語(〈滯留海外倏踰三載，追維所歷不無慨焉〉，1-338)。遠宦臺灣，對大多數仕宦者而言，大多有著羈旅天涯、棲遲絕域的無奈。檢索清代相關作品，被調派來臺之際，心中充滿豪情壯志或歡喜之情的詩作數量相當少。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任鹿港同知，旋署淡水廳事的雲南人曹士桂是比較特殊的例子，他有〈東渡〉詩云：

茫茫大海，渺渺孤舟。捧檄東渡，泛彼中流。帆隨風轉，水與天浮。躊躇四顧，快哉壯遊。(5-116)

這樣的躊躇滿志，確是宦臺人士裡的異數。曹士桂來臺之時(1847)，清廷已經經營臺灣百餘年，許多規矩制度都已建立，不似初開墾時的荒蕪粗略；但這並不表示來臺者已全然消除東渡的愁鬱不安。與曹士桂同時，甚至是更晚東渡來臺者，依

然是心情沉重而愁緒滿懷的。以下試舉孫元衡（1705）、朱景英（1772）、胡承珙（1824）、劉家謀（1852）的詩歌為例，以對照、觀察不同階段的文人對「遠宦來臺」的態度：

中原遙隔水盈盈，一雁南飛萬里程……君自悔遊余悔宦，總無長策不歸耕。  
（孫元衡〈家人至讀安其大兄去秋自秦關病中所寄手書〉，1-261）

望洋老淚痛人琴，萬里悲風一寸心……卑官絕域原無戀，鄉國泉臺不可尋……  
（孫元衡〈哭安其大兄〉，1-287）

三年海外身，就木已一載……無年為誰慟，遠宦只自悔。（朱景英〈遣家人送二姪樞渡海歸詩以志悲〉，3-47）

清時多病終無用，絕域能還亦偶然。（胡承珙〈因病得告〉，4-135）

鄉書迢遞將三月，宦海蹉跎又一年。（劉家謀〈酒後〉，5-333）

對於「遠宦」生涯，孫元衡、朱景英都以「悔」字概括之；尤以孫氏在其大兄過世時所寫的「卑官絕域原無戀」，最能道出宦臺者的心情。至於清中葉來臺的劉家謀，則對渡海擔任學官一職，有著遠滯南荒，宦海蹉跎的感慨。

臺灣之所以被視為「絕域」，主要因為處於遐荒偏遠之地，海上波濤多險阻，氣候與中土殊異，尤其炎蒸多瘴，為中土人士所不堪。孫、朱、胡、劉四人皆曾為疾病所苦，或與病疫有關。孫元衡的〈病後書懷寄篠岫〉云：「病餘秋氣總陰森，一卷莊騷苦竹林」（1-266），在病後對臺灣的瘴毒，有著畏懼不安。朱景英本身雖安然無恙，但隨之渡海的姪子卻於來臺後第二年病逝。胡承珙因病重已極，終究得以調離臺灣。至於劉家謀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調任臺灣府訓導，咸豐三年（1853）夏天因病卒於任內。清朝來臺吏員因水土不服而病逝者所在多有<sup>38</sup>；即使到了日本統治初期，日人同樣為瘴癘所苦<sup>39</sup>，直到日本總督府開

<sup>38</sup> 據劉銘傳〈臺灣水土惡劣知縣員缺請飭部暫寬例章變通補署摺〉云：「竊據布政使邵友濂詳稱：『臺灣知縣一班，本年春季病沒數人，三次請調閩員，僅來李承緒一人，近又病沒……查臺地煙瘴橫生，水土惡劣，兩年間病沒廳縣十餘員。奉調之員，聞風裹足，各縣懸缺未補至八九缺之多。現據代理鳳山縣知縣吳元韜稟報，病勢沈危，急需委員代理……詳請速核辦理』等情」，參考《劉壯肅公奏議》，卷九，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十七種，頁401。

始進行現代化的衛生措施之後，這個「美麗島最可怕的烏雲」的威脅性才慢慢地減緩<sup>40</sup>。

視來臺為畏途，除了「遠宦絕域」所帶來的不安之外；另一個因素則是對故鄉的思念難捨之情。覽讀清代宦臺詩人的詠懷抒情詩，有大半作品帶著憂傷的情懷；即使是迎春的歡樂歌詠，到頭來還是被哀傷所淹覆。這種憂傷，往往與故園之思緊密勾連。孫元衡來臺之初雖然曾誇下「我與蘇髯同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抵臺灣〉，1-259）的豪語，但任職不久之後，他心裡開始飽漲著濃濃的離愁，由於這個遙遠的「南荒」，將他與故鄉斷然阻絕，因而感到深深的惆悵。他說「萬事灰心渡海身」（〈詠荔枝〉，1-263），對渡海來臺起絕望之想；日落黃昏、臨海遠眺之際，他慨嘆道：「他鄉莫望遠，獨立況黃昏。」（〈晚眺〉，1-260）、「鵲鴿飛不到蠻天，萬里艱難夢宛然。」（〈答篠岫弟到榕城見寄〉，1-261）。當他嘗試藉酒以消愁時，卻發覺愁懷更深。身世如纖塵般的漂泊感，故園迢遙的失落感，使他只能披襟向空長嘯<sup>41</sup>。來臺的第一年，孫元衡有〈送抑隅還西泠〉詩，細膩地寫出了他對中土的憶念：

西子湖邊有舊居，黃逢橘柚白鱸魚。吳山若見寒潮滿，當是天南萬里書。（1-266）

友人將歸西泠，送行之際，江南的物產——黃色的橘柚、白色的鱸魚，不禁勾引起他的鄉愁，末二句云：「吳山若見寒潮滿，當是天南萬里書」乃相當動人的想像之筆：潮來潮去，當你發覺故山的湖水高漲之時，那必是我在遙遠的南方，憑藉寒潮，傳達濃濃的思念之情給故鄉的你。孫氏為安徽人，而友人歸返的是杭州西子湖畔，其實兩者並不完全等同。可見宦臺人士的「鄉愁」，繫念的不一定單指詩人的故里或出生地，往往指的是他所稔熟的中原。那裡的氣候、物產、地理環境，都在一次

<sup>39</sup>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謂日本接收臺灣之際，近衛師團除了遭遇抗日軍頑強的抵抗外，也苦於臺灣的瘴病，因而戰鬥力大減，台北：聯經，1997年10月，頁113。

<sup>40</sup> 參考李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衛生論述（1898-1906）為主》，成大臺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

<sup>41</sup> 孫元衡〈初春雜詠〉八首之一：「披襟向空嘯，身世飄纖埃。揭來雙飛燕，翻翻更徘徊。既酌不成醉，躑躅臨高臺。」（1-278）。

次與臺灣的對照中益發明晰地呈顯。

如上所述，宦臺者的內心幾乎都有著濃重的憂傷，必須尋找某些出口，始足以安撫內在的悒鬱苦悶。秋的悲涼蕭颯，適足以成為詩人吟詠愁懷、撫慰憂傷的最佳憑藉。然而，臺灣晴暖的秋季，卻與中國傳統文人認知裡，理當是蕭條、淒涼的況味存在著相當大的落差。來臺文人滿腔痛苦愁鬱，卻無處安頓，這或許便是他們之所以不斷探問清秋訊息，乃至因遍尋不得秋意而惆悵、失意的主要原因吧？

## 2、迎春與傷春書寫的匱缺

至於春季，在中國傳統書寫裡，主要有「歡樂」與「悲傷」兩種取向。前者緣於春光明媚而產生的歡欣愉悅：春季來臨時，意味著沉睡的復甦，死亡的再生，從寒冬冰封的大地，開始綻放綠意與生機，因此有著「迎春」的悅樂開懷。後者則是因為美好時光的消逝，而滋生哀嘆、惋惜。晚春時節，眾芳蕪穢，令人有著「傷春」的厭悒憂悽。不過，清代來臺文人的春季書寫裡，似乎少了傳統文人筆下，迎春與傷春的詩作。對來臺仕宦者而言，他們所熟悉的，屬於「春」應有的杏花春雨、料峭春寒或三月煙花……在臺灣其實並未鮮明地呈現；而因植物四時常青之故，也罕見因花落如雨而有的傷春歌詠。換言之，在臺灣和暖的氣候下，「迎春」與「傷春」的傳統書寫是匱缺的，緣此，我們看到了來臺詩人殊異於中土的春季書寫。

然而，這並非意味著，來臺詩人春天的歌詩是「不喜亦不悲」的，以孫元衡為例，《赤嵌集》中有許多寫於春天的詩，比如他〈春興〉組詩中的三首（1—285）：

春臺花滿赤嵌邊，萬里流光海市妍。魚鳥之間遊化國，圖經以外問桑田。波吞廣漠原無地，帆飽曾颺欲上天。自識浮蹤真在夢，煙中著腳鏡中旋。（之一）

北闕南鄉思不禁，拋將身事任浮沉。宦情老隔鯤鵬路，歸夢遙逢睨眈音。檻外花光紅露滿，門前春氣碧雲深。忘機習靜饒生意，葉葉甘蕉展故林。（之三）

門有煙波屋有林，筭無華袞橐無金。芳春逸興花同發，永夜遙情月共沉。鸚鵡螺前開笑口，蠹魚編裡問初心。散人乞得閒官職，天外應須著冷吟。（之

## 五)

上列作品，可以明確地看到與「春景」有關的描寫，在字裡行間呈顯春季特有的明媚妍麗與湍飛逸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試著將這些句子放回整首詩的情意脈絡來看，卻發現歡愉的不純粹性。雖春暖花開、芳香襲人、海市鮮妍，但作者卻慨嘆浮蹤如夢、歸路迢遙；煙中著腳、鏡中旋身的比況，皆緣於宦旅生涯的虛浮、不踏實感。因此，孫元衡更多寫春季的作品，是與「鄉愁」、「宦情」緊密結的：「喚起春愁侵曉夢」（〈春暮〉，1-308）、「詩將秋思赴春愁」（〈迎年菊〉，1-330）、「春思羈愁兩自知」（〈旅宿對月有懷〉，1-332）。是不是因為孫元衡在榛莽待啓的治臺之初東渡，居處的簡陋、風土的不適、雕題黑齒的陌生感，才會使得他產生了濃濃的愁緒呢？恐怕不全然如此！我們試著看清代中葉（1849）福建福州人劉家謀來臺擔任府學教諭時，雖然前來的是與故鄉生活環境極類近的地區，雖然當時臺灣的開發已達到一定的成熟度，但是，劉家謀寫春天，依然充滿愁懷。〈春日憶東洋諸同志〉云：「飛光隨海水，浩浩何時還？百草媚春風，徒凋游子顏」（5-347）；〈飲酒〉詩云：「嶺外荒遐地，三年滯一官……早愁滄海上，相望路漫漫」（5-317）。「宦情」與「鄉愁」似乎恆常緊密地糾結著，在暖風吹拂、百花盛開的舒適季節裡，宦臺者真正能坦然地遨遊春景，盡情歡樂的時刻，實在是微乎其微。

## 3、草木鮮零落的冬季

在《赤嵌集》三百多首詩作中，寫於冬季的有十八題二十八首，而從詩中明顯地看到孫元衡描寫「冬景」者，數量非常少：

客久澹無欲，無鵲非所望。斷我近音信，無鴈成兩傷。燕驕不肯蟄，仲冬來草堂。菊以玉為蕊，榴如琴有房。傍帷鳴蟋蟀，依戶守蛩螿。宵深一葉墮，十月天微涼。寄言閨中子，毋念我衣裳。（〈感物候〉，1-275）

欲行還輟駕，塵思坐來清。竹密翠相倚，榴寒火更明。遊蜂喧午隊，凍鳥作春聲。詎羨南荒隱，悠悠計此生。（〈冬日題何秀才書堂〉，1-296）



……三歲迫驕陽，以我禦窮薄。物情相慰藉，先聲良不惡。氣候微足徵，天意欣所託。拙宦如老農，關心但耕鑿。雷電司冬令，草木鮮零落……（〈守歲分樂字賦得歲熟鴉聲樂〉，1—322）

儘管季節清楚地標註是在冬天，卻絲毫無有霜雪的痕跡。即使到了仲冬十月，也只在深宵見到微少的落葉，感受到微冷的氣溫。原本應該在冬季蟄伏的燕鳥、蠅蜓與蚨蠖，在臺灣竟然都奕奕有神、生機勃勃；應該是因寒凍而沉靜不作聲的鳥雀以及斂翼潛藏的遊蜂，在臺地卻歡喜地啾啾鳴叫、往來飛舞，宛若中土的春天。孫氏又有〈葉上花樹〉詩云：「海東草木無零落，怪底知寒與眾殊」、「寒蜂咽鳥無常態，浮花浪蕊不待時」（1—325），相當貼切地指出了臺灣物候不依循常態的特色。所有的運轉都偏離了常軌，一切的時序都在散亂中亟待重整。詩人內心的錯愕不安，一定程度地表現在詩作中。這亦可用來解釋，何以孫氏來臺的第一年冬天，會以長篇歌行體描述炎熾異常之地，其〈日入行〉云：

……赤嵌東山高萬丈，金方溟漲天為池。羲和駕馭火鞭疾，霞車虹靷來何遲……巨浪翻光忽騰沸，萬烽並舉邊人疑。豁呀豁間舒長影，燐燐震震焚其逵。烈燄烘雲煩煨鍊，洪爐煮海還蒸炊……（1—299）

通常在寒凍的冬季，罕見撰寫「火鞭」、「霞車」、「烈燄烘雲」、「洪爐煮海」等炎熱題材者。想必孫元衡在溫暖的冬晴，感受不到絲毫寒意，時時有時序感的錯置，故而有此想像之筆吧！

幾乎所有清代來臺者對冬季的書寫，都類似孫元衡所採取的視角，可以說是來臺詩人四季書寫中最弱的一環。1704年任鳳山知縣的山東人宋永清〈上淡水社〉云：「歲暮猶春意，花香趁馬蹄」（1—352）、1722年首任巡臺御史順天大興（今北京）人黃叔瓚〈壬寅仲冬過斗六門作〉云：「冬仲何殊春候暖，蠻孃嘻笑竹圍東。」（1—400）、1769年來臺任海防同知的湖南人朱景英〈臘夜〉云：「殘臘殊方似早秋，宵分只覺露光浮。」（3—35）、1821年任分巡臺灣兵備道的安徽人胡承瑛〈冬日郡郊述懷〉云：「炎微時無準，經冬未作寒。」（4—35）。從詩人的籍貫看，他們或來自中國北方，或來自江南，但都習於四季分明的氣候，因此在季節感混亂、幾

乎沒有寒冬的臺灣，除了一再強調歲暮天暖、冬季無雪，表達個人的遺憾和不適應之外，似乎很少開展出新的寫作視域。

#### 四、結語

鍾嶸《詩品》序云：「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憂歡悲喜情感的起伏，往往要透過詩歌的詠唱吟哦，才足以抒發內在的情思、安頓文人的心靈。其中，「秋」是文人雅士最喜歡書寫的對象。從《楚辭》開始，「秋」便與「悲哀、憂傷」相關連，到了建安與魏晉文學裡，「悲」與「秋」的關聯形成了：一、死亡與衰敗；二、離別、客游、思鄉、孤獨兩組主題<sup>42</sup>。

這其實也是宦臺文人最重要的情意內涵。照理說他們也期待在秋的蕭瑟景致中，找尋足以抒發憂愁悲思的對象，比如：西風、白露、鴻雁、冷月、秋霜、楓葉……<sup>43</sup>等。然而這些承載悲愁的憑藉物，在臺灣似乎不易尋得。宦臺者對於節候感受最明顯的是溽暑炎熱、晴日驕陽……是讓淒涼蕭條景物難以展現的赤地炎方。由此我們稍稍可以理解，何以宦臺文人喜歡結合神話、典故，對臺灣這個炎熱之鄉的熾烈，做誇大的渲染和描寫，並對暑熱充滿了畏懼斥拒；也可以理解，何以詩人要頻頻探問「秋」的消息、尋找「冬」的冷冽，乃至在風光明媚的「春天」有著隱隱的感傷。生長於熱帶及亞熱帶氣候的臺灣動植物，有許多是脫出文人過去生命經驗之外的。依昔時中國文人的習慣，初春時冬雪初融的江水可以用來譬喻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緒；孤雁與霜葉、秋月與梧桐可以用來表達客子的寂寞與淒涼；而冬日大雪，可以將天地寒凍的寂寞孤獨之感呈現出來。然而，當我們以孫元衡為對象，觀察渡海東來的清國吏員所歌詠的詩篇時，卻發現他們表情達意的模式與傳統中國文人存在著

<sup>42</sup> 參考馬樹德譯，德 W·顧彬著《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頁78。

<sup>43</sup> 參考紹毅平譯，小尾郊一著《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頁34。

某種程度的差異。

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及小尾郊一的研究指出，中國傳統文人有許多寫景言情之作，已然淪於公式化的書寫。而這種固定的「畫面庫」，大多由具有時令特徵，並能代表季節特色的景物所組成<sup>44</sup>。到了臺灣，因氣候、環境、物產的新奇，刺激了某些具創意的詩人，使他們能夠擺脫舊有的「形式庫」，以不同的畫面與景物來呈顯心情，讓物候的書寫在臺灣詩人筆下有了新意。比如孫元衡那首極有趣的詩〈海外驚霜叱雪，無復寒林可觀。秋日行經木岡山下，白茅作花，宛如朔雪晨霜，足補山川所不逮，率簡澄菴宋明府〉：

茫茫宿莽本荒塗，行到瀛南勝畫圖。夾路霜華隨野闊，到山雪色共雲鋪。風微灞岸飄楊柳，月澹江天冷荻蘆。黃犢一鞍三榼酒，海邦秋興未全無。（1—295）

詩中所謂的「雪色」、「霜華」其實都是實物虛寫，如詩題所說：「白茅作花，宛如朔雪晨霜」。透過虛擬想像，原本不存在於臺灣的某些事物，遂以特異的風貌，虛幻地存在；或者說原本實存於臺灣的某些物象，透過詩人之眼的特殊凝望，而產生了形質上的變異。這些變異，必須勾連到詩人深邃而又繁複的內心世界來理解，才可能獲得比較準確的掌握。「海邦秋興未全無」的結語，其實是詩人在無可奈何的缺憾中，試圖尋求憂傷的補償。再看一首孫元衡的〈題海邊村落〉：

天南景物正紛紜，瘴雨才過又夕曛。月渚寒山沈白浪，風林冬笋入青雲。巢居泛宅俱成趣，荷鍤施畝自有群。心憶江鄉無別事，千峰飛雪酒微醺。（1—296）

此詩寫於 1706 年，孫元衡來臺第二年的冬天。在這景物豐妍，瘴霧氤氳的晴暖冬日，孫元衡想像故園的飛雪而不可得，只得借詩、借酒，讓蟄伏在內心如蛇虺般咬嚙的鄉愁，在微醺的恍惚迷離中，在文字的想像虛構中，緩緩地抒解……

另外一種抒解愁緒的途徑，不是透過景物的想像虛擬或扭曲變異；而是藉由理性思維的方式，欲將自我從痛苦的泥淖中抽拔而出。孫元衡在登大武郡尋找「似花

<sup>44</sup> 參考馬樹德譯，德 W·顧彬著《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 月，頁 87。

霜葉」而不可得之後，看似豁達地寫道：「秋在中原不用哀」（〈大武郡登高〉，1—272）就讓秋天遺落在中原吧！因為沒有悲愴的秋，也就不會有感傷的自己。又如他在遍尋鴻雁而不可得之後所云：「漫言此地無鴻雁，省卻遼天一段哀」<sup>45</sup>，捎來故鄉訊息的鴻雁不可見，那是再好不過的。就讓彼此的憂傷、想念，封存在大海的兩端吧！如此，也省得我在遙遠的南天，因為思鄉、懷人而無盡地感傷。「秋在中原不用哀」、「省卻遼天一段哀」，詩人或作灑脫語、或作激烈語，皆試圖在「四面環窮海，千山踞島夷」<sup>46</sup>的絕域鬼國尋求脫困之方，化解遠宦與思鄉，甚至嘆老與傷逝<sup>47</sup>的無盡悲哀。

本文以清初來臺的孫元衡為對象，探討清代宦臺文人如何透過既有的文化累積，如何透過他們作為「異鄉人」的敏銳耳目，去感知臺灣物候的特殊性，如何將之化為詩篇，作為自己的生命記錄，並傳遞給未曾渡臺者嶄新的訊息。而後進一步分析，宦臺者觀察、書寫的心理樣態。希望藉由相關資料的掌握、文本的詮釋，更具體地了解宦臺者的情意世界，及其面對生命困局的調適之道；此外，並試圖探討在臺灣這個四季如夏的南方海島，所產生的古典文學作品，究竟具有什麼樣異於中原內地的特殊性？至於，這樣具南國特色的書寫，往下延展到日治乃至戰後，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文類裡，是否具有相似或相異的寫作趨勢……這都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的議題，因篇幅及能力的限制，只能留待他日。

<sup>45</sup> 〈重陽日小憩茄冬社〉：「竹翠山光撲面來，欲酬佳節在深杯。白衣那遣文身著，黃菊毋勞絕域開。已慣風多頻落帽，不因鄉遠罷登臺。漫言此地無鴻雁，省卻遼天一段哀。」（1—273）

<sup>46</sup> 孫元衡〈夏旱〉：「維南新闢地，驚鳥乍安枝。四面環窮海，千山踞島夷。宦情聊復爾，天意竟何知。豈為憂寒餓，含情告雨師。」（1—265）

<sup>47</sup> 清代宦臺人士，除了「鄉愁」與「宦情」之外，還有「嘆老傷逝」的悲傷書寫值得注意。

【附錄】孫元衡《赤嵌集》四季書寫數量統計表

時間	季節	題數	首數	《全臺詩》頁數	備註
康熙四十四年	春	07題	08首	P259~261	
	夏	12題	13首	P261~265	
	秋	32題	34首	P266~275	
	冬	02題	02首	P275~278	
康熙四十五年	春	12題	82首	P278~294	
	夏	02題	03首	P294~294	
	秋	06題	07首	P294~299	
	冬	07題	15首	P299~300	
康熙四十六年	春	16題	37首	P300~308	
	夏	02題	02首	P308~308	
	秋	20題	51首	P309~322	
	冬	05題	05首	P322~323	
康熙四十七年	春	31題	38首	P323~333	
	夏	14題	24首	P334~340	
	秋	13題	19首	P340~346	
	冬	04題	06首	P346~347	
總計	春	66題	165首		佔總數量的 47.77%
	夏	30題	42首		12.13%
	秋	71題	111首		32.08%
	冬	18題	28首		8.09%

